

动则三思，虑而后行 ——感谢我 25 年前的中国朋友

旅居中国多年，不同的人、不同的思考方式让我明白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工作的困难，我常常提醒自己：行动前必须反省和沉思

文/艾德（Michael Aldrich）

艾德（Michael Aldrich），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北京合伙人，在公司法和商业法领域经验丰富，同时是电信领域的专家。大学学习历史，后获法学博士学位。著有《消逝的北京》一书

做一名优秀的国际律师，不在于思考速度是否快，而在于反应是否慢。

乍听这句话，似乎违背直觉，一次，我步行路过北京齐家园外交公寓旁的一家印度餐馆时，亲身的经历印证了这句话。

人行道上，褪了色的陈旧紫漆斑点，还有那些久远的图画在餐馆的外墙上几乎已磨蚀殆尽。历史的感觉让我慢下步来，思绪飘回到 1983 年，回忆我的美国家乡——长岛，以及我那时的中国朋友。

一个人的成长背景和环境非常重要。1949 年，我父亲在两个朋友的帮助下亲手建造的一幢房子，那就是生我养我的家。父亲掌握了木工与石匠的知识，且用于实践，建设我们的家。有了这些纯熟的盖房技术，房子可以保持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之久。父亲采用防潮的雪松木盖房子，在内墙与外墙之间，放置了六英尺的绝缘材料。每一扇门，每一个窗框，皆取自整块木头，并经过细致处理。雨水槽和百叶窗都要上漆，且在上漆前必须用手工刀将旧漆除去。父亲用大锤费力地弄出了一个深入地下 25 米的水轴，使得管子连接到水面，为家人提供新鲜水源。我们的房子堪称一件功能性的艺术品，尽管孩提时代的我并没有认识到。

我与父母的感情非常好，他们不仅仅是我的父母，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以及最重要的老师。我十九岁在乔治敦读大学时，父亲突然去世，这几乎令我崩溃。一年半以后，我母亲罹患脑癌。我返家照料她近一年的时间，直至她失去行动能力而不得不入院。她在半年后去世，那一年我 22 岁。

我在乔治敦求学的时候，亚洲，尤其是中国，是我向往的热土。当时，还没有任何迹象看出中国会成为今天这般的经济中心。

当时，大多数美国学生中的“中国迷”从中国的哲学和历史获得了灵感，常常甚于物质财富。很多美国学生对我们对中国的兴趣、热情不理解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大量地阅读诸如徐中约《中国近代史：中国的奋斗》、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》以及史景迁的《天安门》等书籍。一些同学在林彪对毛主席的引语中找到他们的政治灵感时，我则沉溺在老子、庄子以及禅学的神秘海洋里。我们还参加了每学期八分的汉语课程。多数人认为我们疯了：低于平均的成绩，失去了上层社会地位、差强人意的社区学院里的研究生生活、一份不需要打领带的工作、破产，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失败……

在家照料母亲的日子里，我发现时间在双手中的分量越来越重。坚持 24 小时的护理非常困难，终于，我找到了一位护士帮忙在白天照料母亲。借这个机会，我在近旁斯托尼布鲁克的纽约州立大学上《亚洲学》课程。大学里有四万名学生，其中十分之一是来自东亚的交流生，他们追慕学校工程学的声望而来。来自中国的学生分成两类。其一是公派留学生，他们在美国只停留一段有限的时间；另一类学生，靠美国亲戚资助，大多来自在文革

中蒙难的家庭，不确定以后是否要回到中国。总体上，在斯托尼布鲁克约有三千名中国学生。

我很快地成为中国人中的一个名人，或者说一个怪人。我答应为那些公费留学生开英文对话课，并且我很快分清楚谁是干部谁是学生。

我大多数的中国朋友还是那些亲属资助的学生。作为仅有的一位对中国感兴趣的外国人，我逐渐融进了他们的团体。在那段不需照料母亲的时间里，我开车载着我的朋友们到几英里外的政府中心，帮助他们办理社会保障卡。我向他们介绍，如何在超级市场里购物，美国人对排队的执着等等。我告诉他们长岛铁路的时间表，我带他们去诊所，帮他们温习英文功课。作为回报，中国的朋友们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晚餐，以及同游海边或者公园。那些日子，让我暂时忘记了母亲不断恶化的病情，也让我开始适应中国社会的习惯和风俗。

母亲去世的时候，我感觉一切生活的依靠都崩溃了，我被迫开始了独自一人的生活。在悲痛之中，我想要留住并且保护好我们的房子，作为对父母的纪念。这房子是唯一能与我的过去相连的真实的東西，在我心中，它几乎成为了一座神殿。

与父亲不同，我没有盖房子的纯熟技术。雪松木的排水槽和百叶窗都急需重新粉刷。仍未从悲痛中解脱的我决定接受挑战。我对一位来自上海的朋友大卫说：“我要做这件事。”他欣然相助，我亦乐于接受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一个错误。

为一所二十世纪中期风格的美式房屋重漆雨槽是件乏味的事。要如父亲期待的那样做一件精湛的工作，必须轻轻地、但完全地剥落掉雪松木上那些已经干燥的油漆。因为雨槽是弯曲的，所以用平刃刮刀除漆十分困难。如果压力过大，木头上会留下痕迹，如果不仔细一点，手指会有碎裂的疼痛，有时会伤及指甲。另外，这项工作必须在夏天完成，那时太阳会使木头干燥，最佳的工作时间（对于木头而不是工人）是在中午阳光最强烈的时候。最后，木头清理干净以后，上漆是要十分小心的，要避免漆点落在窗玻璃上。在我父亲的技术概念里，没有什么比玻璃上的油漆点更糟糕。

我向大卫说了这些，但他没有完全领会。他到美国之前，一直住在上海的一所公寓里，对于雨槽和百叶窗一无所知。他也没有听说过雪松木。我没注意到他长我五岁，虽然他未曾做过任何油漆的工作，但却把这想象成了一件轻而易举的事。他高高兴兴地爬上梯子，在房子的一角开始了他的工作，另一边我也在干活儿。那时我还未曾踏出美国一步，非常荒唐地认为，全世界的房子都是一样的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猜大卫一定觉得我是一个“事儿妈”的“老外”。以他看来，我干得很慢，并且坚持要在一天中最不适工作的时候工作。当我看到他没有刮掉旧漆的时候，我很大声地把梯子推到他那边，完成那些工作，这自然会令他感到不舒服。只要我在百叶窗上看到了刮痕，我便觉得父亲该会十分的惊骇。最后，当我看到父亲最心爱的椅子旁的窗子被滴上了白色的油漆点时，我几乎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。不仅仅是双亲的去世，让我难过的是，连维修父母白手起家的房子，这样的简单的事情都不能做好。

我和大卫在一起干活的时候并没有发生激烈的争吵，但是我们的心情都不太好。大卫对我的性急和赌气感到困惑。而我自己，当意识到自己没有维护房子的能力，甚至我与大卫的工作方式令这房子比之前更糟的时候，也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我们并没有急于表达什么，但是无声的交流——“冷战”却是十分清楚的。第二天，大卫说他有另外的事情要做。我以不大好的态度接受了他的决定。我的心情在接下来的一周里继续郁闷，我知道，我试图保存过去的愿望彻底被粉碎了，我觉得：“大卫让我十分失望”。

很明显，在我们两个之间存在着一种基于文化背景上的误解。在大卫看来，我不欣赏他的工作，并且脾气很坏。我对他也没有表现出一种恰当的对待长者的尊重，而我并不理解法律业者——动则三思，虑而后行——感谢我25年前的中国朋友——艾德

面子问题，也不理解大卫在漆窗子时明显表现出的对于“孝”的漠视。在我看来，他的疏忽是有伤害性的。

那件事以后我与大卫之间有一段时间的冷淡。渐渐地，我们失去了与对方的联系。旅居中国多年，各种思考方式的影响让我终于明白，那一天为什么会那样不愉快。那一天也是一堂很重要的课——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工作的困难。

我和大卫都太快地为对方下了否定的结论。如果那时我已经有过在中国居住的经历，或者仅仅在朋友的背景上考虑得多一些，也许情况会好得多。当世界日益变小时，多思考，少做绝对性的判断是一种健康的心态和交往的艺术，我们每天都需要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人。

这些想法在我脑中如闪电般出现。我从北京建国门外大道旁人行道上的紫漆点往回走，去上班的路上，我希望把自过去得来的经验应用到工作中去。

多元的生活和工作环境，让我明白了来自世界四面八方的人的敏感性，我常常警示自己：在行动前必须反省和沉思。对于大卫，我感激他，在25年前那个闷热的日子里，他教给我思考这一切。

版权所有 © SGLA 2008。

此出版物仅供阁下参考和兴趣阅读之用，无意作为完整全面的信息，并不构成亦不应予以依赖为法律意见。请根据自身情况寻求专门咨询。